

四海友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侵华日军的罪证：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写下《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首次向世人系统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摄影机拍摄沦陷后的南京，并由国际人士带往英国、美国、德国等地放映……

中国战场上，还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在拍摄于1938年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中，伊文思记录中国人民的抗争与希望，为中国抗战赢得广泛的国际声援。以此为开端，伊文思的国际情缘绵延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吸引他一次次回到这里，以影像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

从“电影诗人”到“电影战士”

1898年，伊文思出生于荷兰小城奈梅亨的摄影世家。从小耳濡目染，他对动态摄影情有独钟。年轻的伊文思遵从父亲安排，在欧洲各地学习摄影技术和经济学——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接手家族企业，度过安稳优裕的一生。

然而，时代的浪潮把伊文思引向另外一条人生道路。1927年至1929年，伊文思拍摄实验电影《桥》《雨》，影片对思想与诗意的融合为他赢得“电影诗人”的称号。1930年起，他数次受邀前往苏联学习、交流。这段经历为他一生的社会主义信仰定下基调，在左翼思想洗礼下，“诗人”成长为“战士”。

20世纪30年代，伊文思带着摄影机，走进比利时的煤矿、西班牙的战场。他的镜头中，比利时煤矿工人境遇悲惨却互助团结，西班牙人民奋勇抗击法西斯势力。伊文思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什么地方在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爆发全民族抗战的中国，自然吸引了这位“电影战士”。他不满西方国家对日本法西斯的姑息，决心前往中国，拍摄一部真实反映抗战的纪录片。

1938年初，伊文思与著名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等人一道抵达武汉。在努力获得国民政府的通行令后，他们立刻前往台儿庄战役前线拍摄战争实况，随后辗转多地，拍下武汉人民献金抗日、郭沫若在群众大会上作演讲、西安人民抗日游行等场面。

以拍摄为契机，伊文思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拍下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在军事会议上讲话和研究军事形势的珍贵画面。虽然前往延安和华北敌后拍摄八路军的计划因重重阻碍未能成行，但在离开中国前，伊文思将自己的35毫米摄影机连同2000英尺胶片赠送给了八路军。1938年秋，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

将中国之声传向世界

——荷兰导演伊文思的中国情缘



录电影制片厂前身)成立，袁牧之、吴印咸等电影人正是用这些设备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拉开人民电影事业的序幕。这台摄影机后来成为延安电影团最重要的拍摄器材，记录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宝贵影像。

1939年3月，《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公映，并在此后几年里于欧洲多国放映。继马罗尔《人的命运》、赛珍珠

以电影创作抒发对中国的深情

最令伊文思牵挂的，还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伊文思曾经拍摄过、交往过的许多朋友邀请他造访中国，记录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家的奋斗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伊文思和中国电影人合作完成《早春》《愚公移山》，记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平凡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厂长钱筱璋回忆，伊文思曾在零下40多摄氏



▲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
▲纪录片《早春》海报。
▼纪录片《风的故事》海报。

以上图片均为**缴蕊**提供



旅人心语

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念书时，我住在牛津街，每天步行一小时前往泰晤士河畔的河岸街上课。这两条街，一北一南，被视作英国戏剧圣地——伦敦西区的两条边界。

我每日的起点是牛津街的塞尔弗里奇百货。美国商人塞尔弗里奇痴迷戏剧，夜夜流连西区剧院，也将戏剧引入这家1909年创办的商场。这里曾展出首架成功飞越英吉利海峡的飞机，并售卖西区舞台上演员的同款华服。进入21世纪，这家百货公司仍用橱窗讲述迪士尼的圣诞童话，精美的灯光布景将商品层叠包裹进美好想象，让顾客在购物时也仿佛身处剧院。

从牛津街转向东南方向，一间间剧院映入眼帘。曾几何时，西区对我而言几乎等于桑德海姆剧院（见右上图，影像中国）。自2004年起，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一直在此上演。从买半价票的学生，到买全价票的戏剧教师，我看过《悲惨世界》不下10次：从传奇机械旋转舞台，到2019年采用投影、灯光和新视觉设计的现代舞台，在戏剧演出方式更迭之外，我更看到演员们的文化背景愈发多元，观众席里的面孔也愈加年轻。

西区当然不只有《悲惨世界》。走出桑德海姆剧院，沿沙夫茨伯里大街走向皮卡迪利广场，再拐进干草市场街的国王陛下剧院，《剧院魅影》正在上演；或向南、向东行经莱斯特广场和

伦敦西区的戏梦之旅



科文特花园，去莱西姆剧院看《狮子王》，去诺维罗剧院看《妈妈咪呀！》。在步行十几分钟的半径里，观众从19世纪的巴黎歌剧院来到广袤的非洲大草原，又跳跃至希腊海岛，在40余间剧院营造的幻梦中穿梭。

18至19世纪时，伦敦西区常与梅费尔、圣詹姆斯等地的奢华世界联系在一起。为靠近王室居住的圣詹姆斯宫，贵族富商纷纷西迁，伦敦西区逐渐成为英国上流社会的核心舞台。那时，观众在国王剧院（国王陛下剧院前身）欣赏的不是音乐剧，而是欧洲传统歌剧。根据英国《剧院许可法》，在1737年到1843年间，观众如果想看正剧（例如悲剧、历史剧或莎士比亚戏剧），只能去德鲁里巷皇家剧院、科文

特花园皇家剧院等几间特许剧院；以莱西姆剧院为代表的大量非特许剧院，只能通过举办蜡像展、上演马戏等经营方式才能生存。

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城市不断扩展，中产阶级兴起，越来越多市民渴望进入剧院，特许剧院的数量已无法满足大众文化需求，相关制度宣告终结。1878年，英国传奇演员亨利·欧文接管莱西姆剧院，成功实践了由核心演员同时担任剧院艺术领导者和商业经营者的“演员经理人”模式。他制作并主演了《哈姆雷特》《麦克白》等莎剧，让经典戏剧融入大众文化，也令莱西姆剧场跻身戏剧中心。

再沿河岸街前行不远，便来到萨沃伊剧院，这里是我的西区终点。与

氏度的严冬踏雪履冰，深入中国东北的海拉尔，也曾前往春寒料峭的江南水乡。每到一地，他都兴致盎然地和当地人交谈，谦虚地向他们学习。“伊文思不是感情轻易外露的人，常常是把感情默默地放在心坎里，但是你却总能从他亲切而深情的炯炯眼神中，感受到他心灵里热爱中国的真挚情意。中国的现实图景激发着他的创作热情，使他不停息地酝酿着报道中国的意念。”钱筱璋说。

伊文思与中国电影人的深情厚谊，更浸润着幕后数十年的交流合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应邀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顾问，为新中国培养电影工作者。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司徒慧敏这样回忆：“伊文思把中国电影事业、电影艺术工作中的每一步成功和每一点失误，都当作自己的成功与失误一样关切。”伊文思不光教授拍摄技巧、艺术观和视听理论，还广泛介绍西欧、拉美和亚非地区的电影业发展经验。他深入人民、真实自然的拍摄方式深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电影人，曾与他一同工作的王德成、石益民等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纪录片事业的中坚力量。

在冷战历史语境下，伊文思也曾因支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遭受质疑。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继续以电影创作抒发对中国的深情。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爱从来不是抽象的，无论是重要政治人物，还是普通劳动人民，在他的镜头下都如此真实、亲切而鲜活。

1984年，伊文思前往中国西北沙漠，拍摄自己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在这部作品中，年逾八旬的导演仿佛再次回到“电影诗人”的位置。他与孙悟空、嫦娥、兵马俑、长城等中国文化意象展开对话，向它们诉说自己一生的理想与追求，并将自己对电影与革命的思考托付给阵阵劲风，从中国大地吹向世界。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电影于1988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再次向世人证明他对中国爱之深沉。次年，伊文思在巴黎逝世。

终其一生，伊文思以影像记录20世纪波澜壮阔的全球革命现场，更为时代巨变中的普通人留存鲜活的精神风貌。回望他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许多内容超越了当时的主流电影理念，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振奋人心。今天，中国观众仍能在《东方主战场》《胜利》等历史纪录片中看到伊文思留下的珍贵影像：台儿庄战役紧张的指挥现场，群情激昂的民众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这些画面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唤起观众与时代同行的记忆。

2025年底，纪录片《伊文思的中国情缘》沿着伊文思的拍摄足迹展开追寻，他镜头中的人物与故事再次回到公众视野。当年他拍摄过的孩子如今已是花甲老人，回忆当年的拍摄场面时，老人仍然感动于伊文思的真诚、友善与对真情实感的不懈追求。

抚今追昔，伊文思与中国人民始于烽火年代的深厚情缘和牢固友谊，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化传奇。（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莱西姆剧院不同，萨沃伊剧院展示了19世纪末西区向大众娱乐和现代消费文化转型的另一个面向。1881年，理查德·多伊利·卡特创建萨沃伊剧院，为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创作的轻歌剧提供专属舞台。这些作品用幽默讽刺的方式描绘英国社会，将音乐、戏剧和大众娱乐巧妙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萨沃伊歌剧”，既突破欧洲歌剧的精英传统，也为后来音乐剧的发展奠定基础。例如近年上演于此的音乐剧《律政佳人》《帕丁顿熊》，都将观众熟悉的社会生活、流行文化和日常经验融入戏剧，继承并发展了萨沃伊剧院的戏剧传统。

萨沃伊剧院不仅改变了演出内容，也重塑了观众体验。它是全球首批采用电灯照明的公共建筑之一，开幕时很多观众买票入场，不为看戏，只为看灯。1889年，卡特兴建萨沃伊酒店，整合剧院、住宿与餐饮，成为当代都市娱乐产业的雏形。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数彼时萨沃伊酒店的门童古驰·古驰，他服务各国来客，看遍箱包样式，回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后创办了名闻天下的时尚品牌——古驰。他用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将西区故事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舞台。

从牛津街到河岸街，仿佛一部英国现代戏剧发展史。近两个世纪以来，戏剧不断走向普罗大众，戏剧边界从剧院坐席延伸至城市角落，它的表达也与技术、商业和民众生活有了更深的联结。人们来到西区，做一场戏剧之梦，也在这里重新理解现实。正是这些不断拓展的边界与不断丰富的情感，令戏剧越过舞台，向每个人的生命延展。正因此，我一次次与当下并肩，重返西区。

重读《奥德赛》：真正的“返家”



被誉为西方文学源头的两部荷马史诗，气质颇为不同。读完《伊利亚特》后翻开《奥德赛》，读者可能会松一口气：不再是大段的战场厮杀，而是变幻多样的时空、出人意料的人物、瑰丽奇幻的情节。相较于《伊利亚特》几乎始终停留在特洛伊城下，展现战争、荣誉与死亡，《奥德赛》带领读者驶向未知的广阔世界——大海、怪怪、谎言、伪装，以及一位与众不同的英雄。

《奥德赛》（见右上图，资料图片）的故事并不复杂。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踏上返乡之路，因神明阻挠和海上奇遇辗转十年。在故乡伊萨卡，等待他的是另一场危机：家中挤满求婚人，他们挥霍奥德修斯的财产，逼迫他的妻子改嫁，甚至谋划杀害他的儿子。

然而，史诗并未从战争结束讲起。故事开始时，奥德修斯已历尽苦难，同伴尽失，困于女神卡吕普索的岛上。诗人先讲述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的寻父经历，勾勒希腊将倾归乡的图景。奥德修斯直到第五卷才正式登场，他历经风暴，抵达费阿刻斯人的王国，并在宴会上讲述了过去漂泊。费阿刻斯人送他回到伊萨卡，直到第十六卷，父子终于相见，两条叙事线合二为一。

这种结构与《伊利亚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围绕战争主线叙事，时间集中在几十天内，《奥德赛》则不断在现实、回忆和传闻间切换。奥德修斯经历传奇，也讲述传奇：回顾十年漂泊时，他的讲述持续了整整四卷诗。独眼巨人、歌唱的塞壬、食莲人、冥府之旅——这些当今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正是通过他的第一人称叙述才进入文学传统。他的叙述令人欲罢不能，仿佛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他懂得何时渲染惊险，何时博取同情，何时炫耀智谋。

这样一位化身“故事歌者”的主人公，也呼应了整部史诗对讲述本身的迷恋。史诗也多次出现职业歌者的身影。当费阿刻斯的宫廷歌者德摩多科斯吟唱起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在座的奥德修斯悄然泪下——讲述故事的英雄，此刻也成了被歌唱的对象，这样的处理令人思考诗歌、记忆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我们借此得以窥见，荷马史诗曾以怎样的方式被口头创作和吟唱流传。

无论是应对归途中的离奇遭遇，还是对抗家乡的求婚人，奥德修斯都展现出独有的特质，令其与《伊利亚特》中勇力无匹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截然不同。史诗开篇用“πολύτροπος”一词描述奥德修斯，该词可译作“足智多谋”“机敏善变”或“多方应变”，但其字面意思“有许多曲折的”颇令人费解。这一难以界定也难以翻译的品质，指向古希腊文化中的“智谋”：它并非抽象的智慧，而是前瞻、计谋、忍耐、经验和随机应变等诸多能力，令人能在陌生和变动不居的处境中全身而退。

拥有这般智谋的英雄，不断探索未知的世界。但《奥德赛》真正的主题不是冒险，而是“νόστος”（“返家”）。这不仅意味着身体回到故乡，更是身份、荣誉与秩序的重新确立。史诗不断提醒我们，踏上伊

萨卡的土地并不等于完成“返家”。奥德修斯必须重新夺回家园，重新赢得仆人和儿子、妻子的认可，才能真正实现回归。

正因如此，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虽出场不多，却是《奥德赛》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史诗一再将“返家”和守候家园的妻子联系在一起。第一卷中，被困的奥德修斯“深深怀念着归程和妻子”。在第十一卷，冥府中的阿伽门农讲述了自己的不幸——他从特洛伊凯旋，却死于妻子和她的情人联手，并未真正实现“返家”。阿伽门农的警告也令读者越发好奇：珀涅罗珀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如何抵抗那些觊觎王权和财富、逼迫再嫁的求婚人？

珀涅罗珀绝非坐等拯救的女子。她不仅将特勒马科斯抚养成人，还努力守护丈夫的家业。她告诉上门逼索的求婚人，要为奥德修斯的父亲织好寿衣才能再嫁。她白天织布，夜里又悄悄拆掉，如此周旋三年。正是这样的计谋，令她最终等来了丈夫的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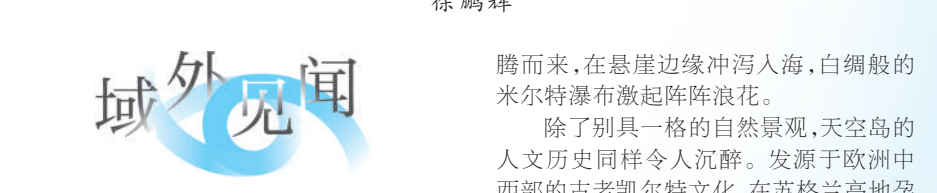
在奥德修斯杀死求婚人后，故事并没有结束。尽管家人仆从纷纷接受了奥德修斯，珀涅罗珀却迟迟不肯与他相认，反而不动声色地对他展开考验。直到奥德修斯说出外人无从知晓的婚床的秘密，珀涅罗珀才与丈夫相认。正是珀涅罗珀对奥德修斯的考验和承认，最终确认了奥德修斯的“返家”，也成就了她的英雄声名。如果说《伊利亚特》的高光时刻是阿喀琉斯与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在共同的苦难中放下仇恨，那么《奥德赛》真正的高潮并不是屠杀求婚人，而是夫妻之间迟来的相认。历经战争、风暴、怪物和漂泊后，真正确认英雄身份的，并非武力，而是记忆、信任与共同生活的秘密。

正因如此，《奥德赛》始终比《伊利亚特》更为驳杂、暧昧：这是一个关于归属和身份的故事，普通人也能从中看见自己。这里有隐藏与暴露的身份，真难辩的讲述，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也有对家庭、婚姻、他者与故乡的持续思考。它仍属于英雄史诗，却又超越了英雄史诗。近3000年以后，再次翻开这部作品，我们依然能在奥德修斯漫长的归途中，读到一种并不过时的人类经验：真正的归乡，从来不仅仅是抵达一个地方，而是重新找到自己的归属。

20世纪以来，国内已有傅东华、杨宪益、王煊生和陈中梅等多位译者翻译的《奥德赛》中文版本，令读者不接近这部文学经典。随着电影《奥德赛》上映，会有更多读者阅读或重温荷马史诗。而真正值得期待的，也许并不仅仅是独眼巨人、塞壬和海怪等构建的奇观，而是近3000年前一个关于归乡、身份与记忆的故事，如何依然能够打动今天的我们。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时间深处的天空岛



斯凯岛位于苏格兰西北部，以原始野性的自然风光和独树一帜的历史文化吸引全球游客。由于英文读音相同，它常被中国游客称作“天空岛”。当风笛声拂过由荒原、峭壁和湖泊组成的高地，当盖尔语在岛上的城堡、灯塔和港口响起，这座“迷雾中的岛屿”正写下北境之地的独特篇章。

跨过连接天空岛与苏格兰本土的斯凯大桥，沿途可见盘旋的白尾海雕、觅食的黑脸羊、散养的高地牛和跳跃的松貂，大大小小的动物们在高山与湖泊间惬意生活。驱车一路向北，由火山活动和风化侵蚀形成的斯托尔山映入眼帘，徒步人群三三两两，顺着蜿蜒的山径攀登。山顶处一块尖峭岩柱拔地而起，从特定角度看酷似老人侧脸，这便是传说中埋葬着巨人遗骸的老人峰了。海风裹挟着水汽，让老人峰时常笼罩在冷雨和浓雾中，只有偶尔的晴天送来久违的温暖。低矮的植被突破岩石的阻碍，展现着蓬勃的生命力。

山与海的碰撞缔造了海崖，远远望去，层层褶皱与纹理斑驳的垂直玄武岩如同精心熨烫的苏格兰方格短裙，“裙岩”由此得名。水流从岛屿东部的米尔特湖奔

腾而来，在悬崖边缘冲泻入海，白绸般的米尔特瀑布激起阵阵浪花。

除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观，天空岛的人文历史同样令人沉醉。发源于欧洲中西部的古老凯尔特文化，在苏格兰高地孕育出核心支脉盖尔文化，天空岛正是盖尔文化的重要保存地之一。时至今日，岛上近三成岛民仍能使用盖尔语，承载着千年记忆的氏族传统、民间歌谣与口述神话代代相传。位于岛屿西北部的邓韦根城堡是麦克劳德氏族的世袭祖宅，它伫立在邓韦根湖的岩岬之上，800余年间，家族传承从未中断，正是高地文明绵延不息的鲜活见证。

在天空岛西部杜里尼什半岛的悬崖顶端，内斯特角灯塔通体洁白，低矮的守塔人小屋静静伫立一旁。塔上，规律闪烁的灯光为航船指引方向。塔下，大西洋的鲑鱼、海豚、姥鲨自在游弋，绚烂日出与绯红日落为灯塔披上朦胧外衣。游人在这里体验宁静的海岛生活，推动这座渔岛蜕变为文旅胜地。

天空岛，在天空仿佛触手可及的地方，静静释放野性的美，让旅人在壮阔的景色中寻找心灵共鸣。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rbgjk@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